

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

· 史 学 卷 ·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编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史学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

ISBN 7-301-03725-2

I.北… II.北… III.①国学-文集②史学-文集 IV.Z126

书 名: 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史学卷

著作责任者: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编

责任编辑:张京华

标准书号:ISBN 7-301-03725-2/C·0144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排版者:北京华伦公司排版部

印刷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新华书店

787×1092 16开本 50印张 1200千字

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88.00元

《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天有 叶 朗 李伯谦 乔 默
吴同瑞 费振刚 赵为民 袁行霈
程郁缀

秘 书:耿 琴

本卷编辑委员会

主编 王天有
编委 王天有 吴荣曾 祝总斌 吴宗国
张传玺 徐 凯 李孝聪 张 帆
罗 新 何 晋

序 言

袁行霈

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年来一直处于开风气之先的地位,许多古老的学科在北大得以改造更新,许多新的学科首先在北大创立发展。这在国学的领域内尤其明显。例如,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是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文学史著作,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小说史的开山之作,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上卷)是用新方法整理中国哲学的尝试,这些书原来都是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或北京大学的讲义。又如,民谣的征集与整理以及由此兴起的民俗学的研究是从北大开始的,中国最早的考古学研究室也是在北大建立的。诸如此类,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

这种新的风气,可以概括为以下两句话:会通古今,熔铸中外。北大的学者大多抱着关注现实的态度,研究古代的学问而不陷于故纸堆中,能够以今人的见识审视古代的资料,得出新的见解。北大的学者大多具有世界的眼光,关注外国的学问,努力与外国学者交流,将中国的学问放到世界学术文化的格局中进行考察,从而开出一条条新路。所以北大的国学研究自有一种高超的眼界、博大的格局和旷达的风度,这一切形成一种学问的气象,从一个方面体现出百年来北大的精神魅力。

北大是一片学术的圣地,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许多后起的学者又继续在这里辛勤地耕耘。如果以三十年为一代,那么一百年来大约有三代学者共同支撑起一座足以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相称的宏伟的学术殿堂。我们把一百年来北大国学研究的成果加以精选,编成《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翻开这部书,读者可以从一个角度看到百年来整个国学发展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今天的国学与以前相比,无论研究的范围,还是研究的观念和方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初章太炎撰《国学略说》,分为“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五部分,所讲的都是我国几千年来固有的学术。现在和那时候相比,论范围已经远远超出,论观念已经几度更新,论方法也已经更加科学化、系统化。仅以小学而论,当初那种以通经为目标的学问,后来发展为以描述语言文字发展规律为目标的学问;特别是甲骨文的发现,更使这门学问大为改观。在这一百年间,也有一些新兴的学科(如敦煌学),进入了国学的疆域;考古学的新成果,则引起史学巨大的变化。凡此等等,都使国学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所发生的这些变化,足以使我们将今天的国学称之为“新国学”,而和以往的国学区别开来。

今后北大的国学研究应当更加注意学科的交叉,在多种学科的交汇点上,找到新的研究课题,开辟新的研究途径,建立新的研究领域。北大的学科齐全,实力雄厚,只要组织得好就一定会出现更加优异的成果。还应当继续扩大对外的学术交流,一方面将中国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介绍给世界,另一方面也从外国的学术文化中吸取有益的成分以充实自己。我相信通过广泛的交流,北大学者的素质会有很大的提高,研究水平也会相应地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上来。

值此北大百年校庆之际,我们谨将此书献给北大,献给中国和外国的好。如能引起学术界的兴趣,我们将感到欣慰。

一九九八年一月

目 录

序 言	袁行霈(1)
-----	--------

张相文	成吉思汗陵寝辨证书	(1)
孟 森	清太祖由明封龙虎将军考	(3)
王国维	殷周制度论	(7)
陈 垣	火祆教入中国考	(14)
刘师培	古学出于史官论(附:补古学出于史官论)	(25)
邓之诚	谈军机处	(33)
金毓黻	大元一统志考证	(37)
李大钊	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	(45)
陈寅恪	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	(52)
傅斯年	大东小东说	(55)
胡 适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62)
黄文弼	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节选)	(66)
顾颉刚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75)
蒙文通	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	(79)
姚从吾	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	(87)
董作宾	五等爵在殷商	(98)
钱 穆	荀卿考	(113)
容肇祖	韩非的著作考	(118)
朱希祖	汉唐宋起居注考	(127)
翦伯赞	秦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	(133)
徐中舒	殷周文化之蠡测	(146)
郑天挺	多尔袞称皇父之臆测	(150)
向 达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节选)	(158)
丁 山	宗法考源	(174)
唐 兰	“商鞅量”与“商鞅量尺”	(185)
赵万里	两宋诸史监本存佚考	(189)
劳 干	汉晋闽中建置考	(196)
单士元	中国档案名称溯源	(203)
邓广铭	《辨奸论》真伪问题的重提与再判	(205)
齐思和	魏源与晚清学风	(219)
商鸿逵	略论清初经济恢复和巩固的过程及其成就	(242)

万斯年	关于西安市出土唐天宝间银铤·····	(258)
邵循正	成吉思汗生年问题·····	(265)
侯仁之	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	(269)
何兹全	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	(282)
王崇武	明初屯垦政策与井田说·····	(300)
张政烺	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	(304)
王玉哲	论先秦的戎狄及其与华夏的关系·····	(309)
周一良	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	(322)
王永兴	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	(332)
陈芳芝	东北之侵蚀·····	(345)
杨志玖	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	(383)
汪 篪	隋唐耕地面积问题研究·····	(388)
杨翼骧	班固的史才·····	(402)
陈庆华	关于石达开的评价问题·····	(405)
王北辰	古代居延道路·····	(412)
许大龄	读《校对一条史料》·····	(425)
田余庆	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	(428)
王承昭	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	(442)
张寄谦	晚清时期中国政治与思想的现代化过程·····	(453)
张传玺	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观念·····	(465)
袁良义	清兵入关的历史功绩·····	(482)
吴荣曾	稷粟辨疑·····	(492)
孙 森	论“文明”的含义以及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	(498)
郑必俊	论两宋妇女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贡献·····	(507)
刘桂生	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误解及其成因·····	(515)
祝总斌	陶渊明田园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528)
张广达	古代欧亚的内陆交通 ——兼论山脉、沙漠、绿洲对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538)
周良霄	“阌遗”与“孛兰奚”考·····	(547)
张仁忠	略论明代官俸·····	(552)
吴宗国	唐代进士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	(561)
顾德融	我国古代的人殉和殉节·····	(572)
余大钧	阻卜考(节选)·····	(583)
张衍田	“文献”正义·····	(593)
王晓秋	清末政坛变化的写照——宣统年间《汪荣宝日记》剖析·····	(607)
王天有	东林党和张居正——兼论东林党的发端·····	(617)
刘俊文	唐律与礼·····	(624)
张希清	宋太祖誓约与岳飞之死·····	(637)
徐 凯	清初逃人事件述略·····	(646)

李孝聪	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	(659)
邓小南	试论北宋前期任官制度的形成·····	(672)
刘华祝	试论两汉豪强地主坞壁·····	(684)
臧 健	宋代家法与女性·····	(695)
王小甫	七八世纪之交土蕃入西域之路·····	(707)
岳庆平	汉代“赋额”试探·····	(718)
阎步克	论乐官、史官文化传承之异同及其意义 ·····	(731)
陈苏镇	《春秋》与“汉道”——董仲舒“以德化民”说再探·····	(742)
韩茂莉	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	(756)
荣新江	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族信仰·····	(762)
刘浦江	金代的一桩文字狱——宇文虚中案发覆·····	(770)
张 帆	关于元代宰相衔号的两个问题·····	(776)

成吉思汗生年问题

邵循正

关于成吉思汗的生年，中外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我以为应以《元史》所记为准。

《元史》太祖纪说：“二十二年丁亥(1227)……崩。寿六十六，葬起辇谷。”据此逆推，知成吉思汗生年是壬午岁，即1162年。今年是他的八百周年诞辰。

《元史》所记有元末陶宗仪《辍耕录》卷一所录《列圣授受正统》为其有力佐证，其文曰：

“太祖应天启运圣武皇帝……宋开禧二年丙寅(1206)十二月，即位于斡难河，自号可汗。至宋宝庆三年丁亥(1227)七月己丑崩于萨里川。在位二十二年，寿六十六，葬起辇谷。”^{〔1〕}

《列圣授受正统》之文显然出于史官，非耳食杂录可比。《元史》和《辍耕录》所记同是出于实录。此外，《圣武亲征录》的癸亥岁(1203年)书事也是重要证明，其文如下：

“上既灭汪可罕，是冬大猎于帖麦该川，宣布号令，振旅归龙庭，上春秋四十二。时乃蛮太阳可汗遣使月忽难”云云。

以此逆推，成吉思汗生年正是壬午岁(1162年)。《元史》、《辍耕录》与《亲征录》所记，皆合。

元代以后蒙族所有的著作，实际上也都肯定壬午岁(1162)为成吉思汗生年。流行最广的如彻辰撒囊在一六六二年完成的《蒙古源流》，明记成吉思汗生于壬午岁。较早在十七世纪初成书的如《蒙古黄金史》(altan tobci)记载也相同，有的写本虽误作“蛇年”(1161)，但接着就说丙寅年(1206)成吉思汗四十五岁(见Gomboev本，页130)，可见“蛇年”明系“马年”即壬午岁的讹写。又如《黄册》作“丙午”，显是“壬午”的笔误。这些都是经过学者考订早有结论的。较晚成书的如《黄金念珠》(altan erike)也是肯定成吉思汗生于壬午岁的，因为他说成吉思弟合撒儿生于甲申(1164)，比成吉思小两岁。

蒙族最早的史籍，即在十三世纪中叶成书的《元朝秘史》，没有关于成吉思汗生年的记载。十七世纪初年以后的著作，和汉籍(主要就是《元史》)有直接或间接的渊源关系，这里我们所应该估计到的。如《黄金念珠》参考《元史》的地方就十分明显。《蒙古源流》有好几处所记月日很具体，也很难认为和汉籍没有因袭的关系。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可以简单地把《蒙古源流》等著作来证明《元史》所记年代的正确性，如法国学者多桑所主张的(见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卷上，页四十)。但是另一方面，《元史》记载本身毫无疑问是有确凿根据的。同时成吉思汗生年，至晚从元末以后已为我国各族一般人所知道，并且公认为没有疑义。如藏族史籍一般也都记载成吉思汗生年为水马年(即壬午年)。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汉文史料中固然有和《元史》等书歧异的，但这只是一些个别的、显然不可信的说法。如南宋人赵珙所著《蒙鞑备录》记成吉思生于甲戌岁(即1154年)。《蒙鞑备录》书中所记当时蒙古社会生活和燕京一般情况，确是珍贵史料，但所记成吉思的事情大都是悠谬无稽的传说，如所言“成吉思乃旧牌子头结娄之子”，竟不知有也速该其人，又如所言“成吉思少被金人虏为奴婢者

十余载方逃归,所以尽知金国事”。这些和成吉思壬戌岁生之说,都只能看作燕京一些汉人的游谈臆说,不能执以讥议《元史》。

此外,还有元至正三年(1343)杨维桢在《三史正统辨表》中所持的说法:

“再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国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与建国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数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属者不苟然矣。”^[2]

成吉思汗生于丁亥岁(即1167年)的说法完全没有佐证,庚申(1200)建国之说也甚费解,表文所言显然是阴阳家的傅会排比,不能据为典故。陶宗仪的《辍耕录》虽录此文,但所作《列圣授受正统》没有理会这种说法。现在已经查出杨维桢这段话是抄自《宋季三朝政要》的,原文如下:

“宋太祖生于丁亥,以庚申建国命曹彬平江南,王师系甲戌岁渡江,以乙亥丙子而平江南,丙子岁是为开宝九年。今大元太祖圣武皇帝,亦生于乙亥以庚申岁即位,命伯颜平江南,大军亦系甲戌岁渡江,以乙亥丙子而平江南,丙子岁是为至元十三年(1276)。”^[3]

此文所说“太祖圣武皇帝”显然是“世祖文武皇帝”之误,因为“生于乙亥”(1215),“以庚申岁(1260)即位”,“命伯颜平江南,甲戌(1274)渡江,以乙亥(1275)、丙子(1276)而平江南”都是世祖忽必烈的事情,和成吉思汗都没有关系。因此,清末李慈铭就已怀疑“太祖圣武皇帝”是“误刻”。杨维桢《三史正统辨表》节录此文,应该说是十分疏忽的。就表文本身,也可以看出“太祖”系“世祖”的讹写。因此,成吉思汗生于丁亥(1167)或是乙亥(1155)的说法,在中国史料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认为,关于成吉思汗生年,我国自来只有壬午岁即一一六二年这个传统说法,这也是唯一可靠的说法。

近代中外蒙古史学者见到伊朗史料所载太祖生于一一五五年(即乙亥岁)之说,转而怀疑《元史》所记。这是不对的。清末洪钧在《太祖年寿考异》^[4]一文中所说的“西域史及西域人私家著述无不谓帝生于猪年,崩于猪年,十三岁丧父亦在猪年”,乃是出于误会。首先,太祖生于一一五五年的说法,唯一的来源就是刺失德丁的《集史》。早于《集史》的术外尼《世界征服者传》记太祖事甚详,但没有一语提到他的年岁。后于《集史》的木思滔非、密尔浑等人的著作,都是直接或间接采取《集史》的说的。西方蒙古史学者过去没有弄清这一点,因而洪钧也就误以为许多史料都证实了刺失德丁的记载。刺失德丁书中几个地方提到成吉思汗生于“开始于回历五四九年十一月的猪儿年”,这个“猪儿年”就是一一五五年乙亥,乙亥岁元旦就是回历五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刺失德丁明说成吉思汗诞生的月、日和时辰已经没有人知道了,但木思滔非误读其文,在所编《史选》(Ta-rikhi guzideh)中竟然说成吉思生于回历五四九年的十一月,即猪儿年初。密尔浑仍之,就说成吉思生于回历十一月二十日,二十日即二十九日的讹写,其实是误以乙亥岁元旦为成吉思的生辰。有些欧洲学者又据此合成阴历,就有成吉思汗生于西历一一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的说法。这些都是源出《集史》而又以讹转讹的,当然不能拿来证明《集史》所记的可信。

其次,刺失德丁所谓“猪儿年”的说法,没有纪录的根据,而是出于西域一些蒙古贵族的传说,再经过星算家的推算。所谓“生年、卒年和丧父之年都在猪年”这样说法,除卒年确在亥年(1207)外,和中国史籍所载全不相符(《元朝秘史》记成吉思汗九岁丧父,而《史集》说是十三岁)。这样说法显然也是出于不明成吉思汗早期事迹和年代的一些阴阳家之口,不能据为典要。刺失德丁自己也明说成吉思汗“四十一岁”以前事情发生的年代都不可考。所谓“四十一岁”相当于一

一九六年,是他自己推算出来的,也并不是成吉思汗实在的年岁。由此可知当时西域蒙古贵族对成吉思汗早年事迹懵然无知,而刺失德丁所记生年乃是十分可疑的。

但是,洪钧以《蒙鞑备录》所记甲戌年(1154)来证明一一五五年说法的近似,又将杨维桢《正统辨表》中“太祖生年同于宋祖,建国庚申”的奇特说法,作了似乎很巧妙的解释,对于“建国庚申(1200)”的说法,他举了成吉思汗招致丘处机诏文中所说的“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企图证明从庚申到丙寅(1206),即太祖即帝位之岁,恰好七年。但这依然不能解释为什么说太祖“建国”是在庚申年。对于“太祖生年同于宋祖”的说法,他以蒙古习惯“只论年支,不论年干”的理由说明成吉思汗“生于乙亥乃与宋祖生于丁亥之岁符合”,正好证明刺失德丁“乙亥岁”之说,但他不知杨维桢所本的是《宋季三朝政要》,而所说的太祖生年实际是世祖生年,竟是张冠李戴。因此,杨维桢的表文对于刺失德丁的说法,丝毫不能有所证明。至于《蒙鞑备录》的记载和刺失德丁之说,只能说是偶合,因为前者是太祖生时燕京汉人的游谈,后者是太祖死后七八十年西域蒙古贵族和星算家的传说。就史料性质而论,两者不能互证。而相反地,就蒙古习惯而论,甲戌岁即狗年的说法,和猪年的说法是互相排斥的,《蒙鞑备录》所记虽不可靠,但说明了当时还没有流行着成吉思汗生于猪儿年之说。

但是洪钧的考证,被过去许多学者看作几乎是定论。中国学者柯劭忞的《新元史》和屠奇的《蒙兀儿史记》都改《元史》以就《集史》。《蒙鞑备录》译成俄文传入欧洲,于是西方学者如巴尔托尔德,如符拉基米尔索夫,都确定成吉思汗生于一一五五年。这种做法当然是很不慎重的,而且就史料考订的一般原则上说也是错误的,因为鉴别史料首先要从史料的性质上考虑,而《蒙鞑备录》和杨维桢《正统辨表》所记,本身就极可疑,如何能以这些推翻正史确有佐证的记载呢?王国维笺注蒙古史料多种,独不取《蒙鞑备录》和西域史料而坚守《元史》之说,应该说是最有见地的。

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学者已开始怀疑《集史》所记,但法国伯希和在二十多年前所提出的成吉思汗生于一一六七年的说法,目前竟风行一时,这简直是怪事。最近欧美东方学界编印的新版《伊斯兰百科全书》,就弃去巴尔托尔德在旧版书中《成吉思汗》条所持1155年之说,而确定成吉思汗生年为一一六七年。其实一一六七年的说法比一一五五年的说法是更明显地错误的。

一一六七年说的根据就是上述杨维桢误抄的表文加上《圣武亲征录》的一段讹文,此外别无佐证。杨维桢的表文似乎是说太祖生于丁亥(1167),但实际就《宋季三朝政要》原文看,却明明是“乙亥”不是丁亥,不是一一六七年。至于“太祖”显系“世祖”之讹,如上文所论的,这里无须重复,这一条所谓证据是完全落空的。

至于所根据的《亲征录》讹文,就是该书丙戌年的纪事,其文曰:

“丙戌春至西夏,一岁间尽克其国,时上年六十矣。丁亥(1227)灭其国以还。”

据同书癸亥岁(1203)纪事明言“上春秋四十二”(见上面引文),因此此处“六十矣”显是“六十五”之讹。王国维笺注本从何秋涛校改“上年六十五”乃是无可非议的。固然现在所能看到的《亲征录》各本所误皆同,同时一三四四年刊行的《佛祖历代通载》文亦同。^[5]《佛祖历代通载》此文既如考据家所说系转录自《亲征录》,这只能说明《亲征录》的元代旧本已有误写,不能证明“六十矣”之不误。但伯希和却以为“丙戌……年六十矣”的说法恰恰可以证实杨维桢表文中似乎存在的“丁亥年”之说,因而认为“上春秋四十二”一语系后人羈入之文。其实“丁亥年”之说在中国史料中既然根本不存在,而“羈入”说也是不可通的。假如“四十二”一语系羈入,伪作者

何至不知改窜卷末“六十矣”一语，疏忽如是，殊不近理。实际问题在于伯希和没有细察文义，不知“上春秋四十二”一语应连上文读成句。也就是说，他没有觉察《亲征录》作者于此大书特书成吉思汗年岁之故，是因为在攻灭怯烈部之后，宣布号令，乃是建业大事，所以郑重书之。照他的读法“上春秋四十二时，乃蛮太阳可汗遣使月忽难谋于王孤部主……”，不但文句不通，所书年岁也成赘笔，类似无知者臆入之语。因此，错误并不在于《亲征录》此文，而在于考证者的疏忽，而何秋涛、王国维对丙戌年记事的校改实是精审可靠的。

如上所述，无论是一一五五年或是一一六七年的说法都不能成立，而一一六七年的说法尤其缺乏根据。因此，成吉思汗的生年，如《元史》所记，至少是比较最可信的，应该据以为准。我想这是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历史学者们所能够同意的。除此之外，并无一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说法。

注 释

- [1]《南村辍耕录》，四部丛刊本，卷一，页十一。
- [2]《南村辍耕录》，四部丛刊本，卷三，页六。
- [3]《宋季三朝政要》，宸翰楼丛书影元皇庆壬子(1312)刻本，卷六，页九。
- [4]洪均：《元史译文正补》，卷一下，页三十六。
- [5]《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九册，页七〇一。

(本文原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

邵循正(1909—1973)，男，福建福州人。1926年入清华大学政治系读书，后考入清华研究院改习历史。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元史、清史。

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

——明史刊成二百年纪念

侯仁之

一 明史之成书

清初之修《明史》，顺康雍三朝，四次开馆，^[1]前后相去，几近百年，即自康熙十八年（1679年）第三次开馆，迄于书成，亦六十年^[2]，历代史事之久，无复过于此者。迨乾隆四年（1739年），全书刊刻告成^[3]，距今又二百年矣。

《明史》之作，早有定评。赵翼曰：“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4]。”钱大昕亦曰：“《明史》……议论平允，考稽详核，前代诸史，莫能及也。^[5]”然考其成书，亦有所本，张廷玉等《进呈明史表》，言之最悉：

仰惟圣祖仁皇帝，搜图书于金石，罗耆俊于山林，创事编摩，宽其岁月。我世宗宪皇帝，重申公慎之旨，载详讨论之功。臣等于时奉敕，充总裁官，率同纂修诸臣，开馆排缉。聚官私之记载，校新旧之见闻，签帙虽多，抵牾互见。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在昔《汉书》取裁于马迁，《唐书》起本于刘昫；苟是非之不谬，诟因袭之为嫌。爰即成篇，用为初稿。

是今之《明史》，实由王鸿绪之《明史稿》删订而成，廷玉等引班固以自喻，先哲后贤，草创润色，相得益彰，允宜为诸史之巨擘也。

二 王鸿绪之明史稿

王鸿绪之《明史稿》，刻于《横云山人集》中，而史稿单行，故或简称曰《横云山人史稿》。又别有《横云山人集》者，则鸿绪之诗稿也^[6]。

《横云山人史稿》实有两次刻本，其一刻于康熙，仅有列传，故又称《明史列传稿》；又一刻于雍正，则纪、志、表、传俱备，是为全稿。降及今日，雍正本流传多而易得，康熙本流传少而难遇，故人多知有雍正本，而不知有康熙本，魏源之《书明史稿二》曰：

鸿绪身后,其子孙镂版进呈,以版心雕《横云山人[集]史稿》,遂得颁发。^[7]

不知鸿绪卒于雍正元年八月,其《横云山人史稿》之初刻,乃在康熙时,不得谓为“身后”,是魏氏之未见康熙本可知。且史稿进呈,原系写本,而非刻本,^[8]后乃自行镂版于敬慎堂,以广其流传也。^[9]

至于前后两稿进呈时,各有奏疏一道,今皆列于卷首。惟雍正刻本,则并载旧疏。读雍正本所附之康熙时进呈疏曰:

自蒙恩归田,欲图报称,稍尽臣职,因重理旧编,搜残补缺,荟萃其全,复经五载,始得告竣,共大小列传二百五卷。

历来讨论《明史稿》问题者,因所见皆为雍正刻本,读所覆刻之康熙本奏疏,遂以为康熙间鸿绪所进之《明史列传稿》,原即二百五卷,未尝置疑,亦无可置疑,^[10]各处征引,亦多以此为据。^[11]况雍正刻本之列传,亦适为二百五卷。因此以为雍正间之进呈本,不过以康熙本二百五卷之列传稿,又益以九十五卷之纪、志、表,合成全书三百十卷,^[12]两本之列传,当相同也。

客岁春间,吾师邓文如先生,始为燕京大学图书馆访得康熙刻本《明史列传稿》一部,喜其难得,亟命余取雍正本列传,校勘异同。按两本内容颇多差异,即卷数分合,亦各不同。雍正本列传二百五卷,而康熙本则实为二百八卷,^[13]卷数既不相符,因又取卷首原刻进呈奏疏与雍正本载者,比而读之,行数形式,抬头降格,全无二致,是即一版。但雍正本“二百五卷”之“五”字,于康熙本正为“八”字。是雍正本重刻时即就原版挖去“八”字,而改为“五”字,以求与雍正本列传卷数相符耳。然事出谁手,则不得而知矣。^[14]

考鸿绪两稿之成,亦多本于史馆旧编。缘《明史》之积极纂修,实自康熙十八年始。时三次开馆,诏以翰林院掌院学士徐元文为监修,庶吉士叶方蔼、左庶子张玉书为总裁,余纂修官彭孙遹、毛奇龄、汤斌、尤侗等五十鸿博,颇极一时之盛。嗣后相继到馆者,又有监生姜宸英,贡生万言(万斯同从子),及布衣黄虞稷。至鸿绪之参与史局,乃在康熙二十一年,时大学士李蔚继徐元文为监修,鸿绪与侍读汤斌及赞善徐乾学为总裁。二十六年九月,鸿绪丁父忧回籍,家居两载,方将服满,尚未赴补,又以事被参留籍,^[15]至三十三年秋,复由监修张玉书之荐,再召回京,重领史局^[16]。到馆之后,与陈廷敬分任总裁。时历年来纂修诸稿,多待总裁覆核,公议由张玉书(曾任总裁)任志书,廷敬任本纪,而鸿绪任列传,各专一类,然后会校。^[17]嗣后,鸿绪食俸居京者,前后凡十五年。^[18]迨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卒以附和內大臣阿灵阿等议奏改立皇太子事,奉命切责,且以原官休致。^[19]

鸿绪归田家居,复肆力于史事,取史馆旧编,重加纂订,又经五载,全书始成,^[20]遂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三月,遣子图炜,赍京奏进,是即上述之二百八卷《明史列传稿》也。后之论者,或责鸿绪不应独擅其成,然自康熙十八年以来,五十年间,历任监修与总裁者,除王鸿绪一人外,其余十人,皆已谢世^[21],即五十余纂修官中,亦仅存毛奇龄一人,且年已九十余矣。^[22]鸿绪以退休之臣,独任艰巨,史事赖以不坠,其功实伟。惟据史馆旧稿,泐为私编,是不无可议者耳。

康熙五十四年二月,鸿绪二次被召进京,领修《御纂诗经》,^[23]即目睹同馆之凋零,复虑《明史》之迄无成书,遂将原进之二百八卷列传稿,重加裁订,合为二百五卷,益以本纪、志、表,遂成全史,于雍正元年六月进呈,是即上述之《明史》全稿也。书既上,由內阁转交《明史》馆收存。七月,史馆再开,总裁张廷玉等遂据以为刊正《明史》之蓝本,而鸿绪竟于八月中死于京邸,年七十九岁,不及见新史之成矣。

三 万斯同之明史稿

王鸿绪《明史稿》纂修之经过及其与史馆之关系,既略如上述,而其中一端,犹有未详者,则为万斯同与《明史》之关系也。^[24]溯自康熙十八年史馆初开之时,监修徐元文即欲以所定史馆征士之例,予七品俸、称翰林院纂修官、延斯同来京修史。斯同本出浙东望族,先人四代,皆死王事,况自身又生当明之末季,心怀故国,岂肯屈事新朝。^[25]然其自幼,究心史事,尤留意于明代掌故。黄百家撰《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记其二十余岁时,尝从人借读廿一史,至两目为肿;于有明十五朝实录,尤所稔熟,几能成诵^[26]。斯同早已蓄志《明史》,欲以传故国三百年之事迹^[27],盖以为国可亡而史不可亡者也,故尝致书范笔山,勉其暂辍诗文,留心史传,其言曰:

故弟之意,愿吾兄暂辍诗古文之功,而留意于此,俟胸中稍有条贯,纵儒生不敢擅笔削,他年必有修史之举,亦可出而陪末议,其与徒事诗文而无益于不朽之大业者,果孰缓而孰急也?^[28]

是清初修胜朝之史,早在斯同意料之中,笔政之操,义不容辞,遂却史馆之聘,请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总裁许之。^[29]

斯同至京,最初十年(即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九年),即馆徐元文家,为徐氏兄弟,裁撰史稿。康熙二十九年,元文南归,斯同亦移居江南会馆。^[30]三十三年,鸿绪重领史局,又延斯同馆其家。后至四十一年四月八日斯同逝世,又将十年。其间除二十七及三十七两年各旋里数月而外,前后旅京者二十二年。此二十余年中,瘁心史事,积年累月之劳,鲜有终日之暇。凡目睹其工作情形者,如方苞杨椿刘坊等,无不惊异其撰核之精与夫工力之勤,时或考定一传一事,辄聚书盈尺者四五或八九不等,^[31]而自诉于刘坊有云:“隐忍史局,弃妻子兄弟于不顾”。其坚苦之志,令人肃然。

斯同既歿,侧无零丁,由鸿绪命人送柩还宁波,生前藏书,遂尽为不肖弟子钱名世所攫^[32]。二十余年之隐忍史局,名既晦于当时,而功复湮于后世,为后学者,虽生而年之后,亦当敬念前徽稍尽表彰之责焉。

斯同生前裁撰史稿,究成若干卷,诸说不一。刘坊撰《行状》最早,所记斯同著书曰:“《明史列传》二百卷,存史馆中。《明史表》十三卷”。次为黄百家撰《墓志铭》,只记丁卯(二十六年)庚午(二十九年)两年“与先生同修《明史》”,未言卷数。又方苞撰《墓表》,谓“季野所撰本纪列传凡四百六十卷,惟诸志未就”。至于全祖望撰传最晚,则云斯同《明史稿》,竟至五百卷。^[33]是为时愈远,传说渐歧,斯同原稿,究成几何、共若干卷,今日皆不可得而知矣。至温睿临承斯同意,纂《南疆绎史》,其凡例有云:

……其后,录得野史数十种,方欲咨访,发凡起例,而万子湮然先逝,《明史列传》甫脱稿,尚未订正也。^[34]

是温氏所记,与刘坊《行状》差近,似为可信。

曩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于书肆中购得写本《明史稿》一部,本纪十九卷,列传二百九十四卷,志表俱缺,相传为万斯同史稿。惟卷首鈔有方苞《万季野墓表》一篇,别无他据。李晋华作《明史纂修考》尝及之,信为真本,且疑为方氏所鈔存者。^[35]今是稿已南迁,无由考校,未敢武断其真贋。但据诸家记载,实有不足深信者。窃谓万稿散佚已久,甚难汇得其全,今所见者,虽不能

信为全稿,然其中一部分,或当有保存斯同原稿之可能。果然,亦可贵矣。

四 明史列传残稿

上年寒假,文如师借示《明史列传》残稿六册,^[36]批改删削,丹铅烂然。按其墨迹,有朱、红、墨、淡墨四色,秉笔或出一人,而修改不止一次。间有离析分合之处,而汰冗点烦,远出原稿之上。汇比其批语观之,则于考核取舍之间,隐然有可辨识之点:

(甲) 事实年月以《实录》为本。

孝宗元年卒,查《实录》。天启赐谥,查《实录》。——第一册《杨继宗传》。

《实录》乃宣德六年也。——第一册《徐琦传》。

按原稿“宣德五年诏简廷臣有才望者使安南,”以年数与《实录》不符,故删去,改作,“擢右通政,副章敞使安南。”

此二事《实录》辰小传中不载,须再查。——第一册《郑辰传》。

按指“福建番客杀人”与“南京敕建报恩寺”二事。^[37]

《实录》小传似宣德年间事,须再查。——同上

按“正统元年命辰赈河南饥,时河堤决,即命辰伺便修塞”,句旁加批。^[38]

赐敕查《实录》。——第二册《段坚传》。

按指“成化初”赐敕旌异。^[39]

五人须再查《实录》小传一对。——第三册

按指陈文万安刘翊刘吉尹直五人。

《实录》载此疏否。——第四册《金濂传》。

按指“尝言郡县吏多贪浊,宜敕按察司巡按御史察廉能者,如洪武间故事,遣使劳费,则清浊分,循良劝”。^[40]

查《实录》事迹如何。——第四册《王来传》。

按指“闻有丛祠为祸福,立往毁其祠,识者异之。”^[41]

以上四册,类此诸批,凡 30 余条,皆出朱笔,今举此数条为例。第五、六两册无。

(乙) 旁参野史碑状志乘。

《献征录》载瑁事,亦有可采,再酌之。——第一册《石琯传》。

墨批。

查安庆志书内名宦。——第二册《周济传》。

传首朱批。

此人据李贤《行状》好处甚多。——同上。

墨批,续接上批。

陆完事《名山藏》载之,《吾学(编)续藏书》不载,须再查(墨批)。《纪事本末》乃遗枣梨薑芥四物也(朱批)。——第二册《孙燧传》。

按指“宸濠响燧图已,使人语吏部尚书陆完及诸幸臣去燧,而遗燧枣梨二物以示意。”原稿“吏部尚书陆完、及”七字,又经墨笔删去。^[42]

王元美《弇山别记》甚佳。——第三册《万安传》。

传首墨批。

王元美所为传，佳处甚多，可参酌。《吾学编》亦有简净处，可酌，大抵公传当以景泰时事有功社稷者为主。余当酌减，须俟细酌。不可草。——第三册《于谦传》。

墨批加朱圈。

此传李贤《碑》却简。阿岭，李贤《碑》作河岭。——第四册《方瑛传》。

四册之中，征举所见，约此数种，余相同者，不俱录。五、六两册无。

此外于记事隐晦或不足传信者，又皆一一批注，核其出处，审慎谨严，不稍苟且。如第一册《周新传》首朱笔批曰：“其中事迹查何所本。”^[43]第二册《姜昂传》，于叙南安大盗一段至传末^[44]，亦朱笔批曰：“此数事须查所出。”其他如第二册《宁直传》所载，似皆细节，稍涉可疑，朱笔批曰：“查此等事，载在何书。”又第五册《沙源传》，于“弘光元年九月吾必奎反”以下至传末，朱笔批曰：“弘光以后诸事，取信何书。”按鸿绪两稿及《明史》，于宁沙二人传，则尽删矣。

以上诸端，乃就考核事实而言。至其叙事，删点尤为简洁。寻其笔削之例，约有五事，兹各举一二例如下：

(甲) 小事删。

《石璞传》——第四册

罢归卒。初璞在山西，其妻与诸僚妻宴归，有愠色。璞问故，对曰：今日比肩金（按金字，朱笔后加）珠绮错，吾独萧然荆布，甚不称布政使妻也。璞笑曰：尔何坐？曰：席首。璞曰：使吾墨于官，汝安得此座耶？归之日，室庐不完。

按以事小，墨笔圈去。又同册《何文渊传》，亦墨笔批“事皆小”，尽删其建白诸事。

(乙) 谀词删。

《张惠传》——第一册

惠有行谊，其祖墓尝遭兵燹，尸柩暴露，家人惑术士言，久不修葺，惠既预乡荐，不择期日，身亲舂锄尽掩之。方冬披发徒跣如初丧。后宦游过里，不归家，寝食悉于墓庐。

按朱笔批曰：“此等谀墓词不足信，”大半皆删去。

《段坚传》——第二册

其门人王鸿儒曰：使南阳人士知二《南》之化者而耻淫乱，盖自吾师始。

按墨笔批曰：“门人之言可信乎，”尽删。

(丙) 事有重出者删。

《石亨传》——第三册

时尚书于谦主号令，新定战格，临阵有进无退，将不顾军先退者，掌令官立斩其首。军不顾将者，后队斩前队。由是诸将惕息，无敢不受约束。

按墨笔批曰：“此见谦传，”^[45]因删其文作“时尚书于谦主号令，新定战格，诸将惕息。”

(丁) 奏疏赘言者删。

如第四册《张鹏传》，原稿引景泰四年鹏奏疏曰：

四年，陈时政四事，言：“今虽天下无虞，而怠荒可虑，持敬以永天命，不可不加之意，望陛下悯生民之疾苦，念稼穡之艰难，公赏罚，谨用舍，绝耳目之好，罢不经之费，而后可以庶几也。太子天下本，自册立以来，师保虽备，而养政之教未闻。夫富贵者侈之阶，安佚者骄之府，不及今向学，他日必劳圣虑。请即命出阁，妙简儒臣，日侍讲读，然后圣功可成。怀利事君，人臣所戒，比每遇圣节，或进羊马，或献锦绮，交错殿廷。夫人臣所得升斗之禄，糊口取给而已，自非贪贿，虽高位亦无奇赢，安有余财，堪充进奉？且